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

考古也可以是一件好玩的事

顾 玮 吴央央 整理

主讲人名片

高蒙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、中国考古学会公众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长期在考古一线工作，主持发掘过三峡和南水北调等20多个考古遗址。

近年来倡导公众考古，出版多种面向社会公众的考古著作《铜器与中国文化》《三峡考古记》《考古不是挖宝》《考古好玩》等。

（楼卓怡 摄）

今天的考古人经常参与影视拍摄等“好玩”的事 （高蒙河 供图）

盗墓小说为什么流行？

盗墓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职业，现在盗墓已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，说得夸张一点，差不多被盗一周后，文物就能出境，就能在国际拍卖行上出现。这些年来，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等盗墓小说特别流行，还演过这类题材的话剧，现在又拍了电影、电视剧。不了解考古的人会说，你们考古跟盗墓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也出了很多专业的书，但一般公众不看。其实有些书特别好，虽然从专业角度写的，但并不晦涩难懂，有些就是文化读本。也有专门写盗墓史的书，但都没有《鬼吹灯》等盗墓小说流行。

盗墓小说为什么比业内人士写的学术或者文化类读物更为流行呢？这里面有很多原因。首先，盗墓小说更有故事性，它有人物，有事件，有情节，有过程，有爱恨情仇，这是一般学术书里不可能有的。其次，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寻宝情结，有猎奇心理，当我们阅读盗墓小说的时候，就有点像沉浸式体验，会自觉不自觉地跟小说里面的人物、情节、故事发生某种关联。我也不反对我的学生读盗墓小说，但是不能把它同考古混同起来。

有记者来找我，说高老师你讲讲盗墓有哪些机关，它跟考古有啥区别。我说考古是科学，它是一个事业，盗墓是违法的，两者怎么可以放在一起讲。我之前做讲座时，也会特意去引导听众，比如前两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讲座，题目就叫“考古不是挖宝”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有过记载，秦始皇陵里有什么呢？有弩。而且他还描述，有人进去弩就会发射。而其他的正史里，基本就没有关于暗箭机关这样的记载。因为帝王级别的墓葬本身就是讳莫如深的，这方面的记载特别少，甚至连怎么下葬、哪一天出殡、墓葬怎样营造，一般都没有。我们只有在一些野史或者笔记小说里，才会看到有关墓葬机关的记载。当然我们在考古中也有所发现，比如定陵里确实有顶门石，用石头把门顶上。那里面的人怎么出来呢？谁顶的呢？民间的说法很多。

实际考古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小说描述得那么复杂，但确实有一些防范的措施。比如说深埋，像殷墟大墓得在十几米深，一般的毛贼很难盗掘。比如说凿山，就是在山里凿一个洞，然后门一封，用铁水浇上，外面再隐蔽起来，一般人真的很难找到。这种情况汉代就有，甚至更早的战国也有。据说唐十八陵里，有十四陵用的是凿山的办法，但是其中，只有乾陵没有被盗过。因为过去的盗墓贼，盗了什么都记有账册，但是乾陵没有。据说从唐代开始，就有人寻找乾陵的墓葬入口，一直找不到。我还专门在电视台做过一期节目，介绍乾陵的入口最后是怎么找到的，找到之后又发生过什么事情。那是1958年，修兰西公路，从兰州到西安的公路，炸山的时候把乾陵的石头炸出来了，相当偶然。乾陵直到现在也没有发掘，因为国家不会批准主动发掘帝王陵墓。日本更严格，你看秦始皇陵我们可以去参观，但日本天皇的墓葬，根本不能进。

人们为何津津乐道于考古？

中国考古发展到今天差不多有100年了，这期间中国考古经历了哪些阶段呢？1978年我读大学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只要学会4个字就可以毕业了。什么字呢？首先是“发现”。学会用科学的办法，把文物挖出来，别挖坏了，这就是我们说的“发现”。第二是“研究”。能把挖出来的东西进行整理，按照科学发表材料的规则写一个考古发掘的报告。所以我们大学期间基本上就学了这4个字。

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考古界发生了变化，增加了“保护”的内容。比如说古建怎么维修？器物出土后怎么修复？书画纸张类的东西怎样进行保护？这些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过。现在我们复旦大学文博系，有好多老师专门教学生“保护”，比如学纸张的文物保护，学陶瓷修复，学铜器修复，都是很细的专业。

2000年以后，考古界又出现另外一个词了，叫“利用”。文物的损坏、破败，是绝对的，但我们在合理利用过程中，可以让它们的损坏程度小一点，频率慢一点。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老太太，就是马王堆女尸。20世纪70年代发掘时，当时人们认为古尸不是文物，处理掉算了。幸亏后来还是想办法保住了，留到现在，就成了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文物。

对文物的利用是有限度的，更重要的是“传承”，把它们传下去，能传多久是多久，能不动，尽量不动，这是2010年以后形成的理念。我做过一个学术课题，叫“中国人的文物观的变迁”，研究的是几百年来中国人对文物的认识是怎样一点一点变化的。

考古的理念如今已扩展为10个字，即发现、研究、保护、利用、传承。

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会对考古津津乐道呢？我总结了这么几个特点，从客观属性上说，考古有具象性的特点，是“触手可及的过去”。考古有时空性，非常具体的点位。考古有纪实性，在整个发现过程中，无论看电视直播也好，看媒体的报道也好，确实是比较吸引人的；从心理属性层面分析，考古具有神秘性，考古发现常常与探秘寻宝等联系在一起。它又有民族性，有一些文物确实能引起公众的家国情怀，比如说圆明园的兽首；再从社会属性分析，考古有时效性，一个很大的发现，马上就能成为社会热点新闻。它有轰动性，轰动效应堪比体育和航天新闻。秦始皇兵马俑、敦煌壁画等考古发现，还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心灵冲击，就是我们说的震撼性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，高老师你咋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们的职业习惯是低头调查。有一次在宜兴，晚上出门散步，回来的时候，居然在宜兴大街上捡到一枚铜钱。又有一次去桃花岛，别人都下海游泳了，我在海边捡回一捧瓷片和陶片，那是海水冲上来的，说明附近有沉船，或者周边山上有瓷窑。我们的职业习惯就是低头调查，比如说浙江到底有多少文物，这都要靠长年累月的考古调查得来。

为什么说考古“好玩”？我写过《考古好玩》这本书，专门讲考古是咋回事，我希望考古得到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。我在复旦开大课，有很多同学喜欢选考古的课来听，形成了一个风气。在电视上开讲座，也是为了引起公众对考古的关注。过去，考古人只知道埋头搞研究，但现在考古人跟社会沟通交流越来越多。有没有故事性？有没有趣味性？有没有知识性？有没有学术性和专业性？这都是对考古学家新的要求。现代考古人干的事情越来越多元化。

为什么说考古好玩？现在考古专业的学生要学习设计，要学习怎样布展，怎么去参加评审会，甚至还要写剧本、做雕塑、拍动漫小电影等。比如我们给良渚博物院做4D影院片子的海报，我们拍小场景的电影用于虚拟演播，有些学生也经常客串电影中的角色什么的。这是现代考古人在“玩”的事儿。

最后我要强调什么呢？发现、研究、保护、利用、传承，考古就是干这5件事，考古不单单是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那样一种工作状态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国学堂，有删节）

浙江文学独领风骚的38年

顾 玮 谢斌鲁 整理

主讲人名片

刘鹤 浙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，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浙江台湾研究会理事，浙江省儒学学会理事，浙江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。

研究方向为民国时期的浙江文学、台湾文学，曾主持各级学术研究项目16项。出版学术专著4部，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。

（谢斌鲁 摄）

浙江现代文学的天空群星璀璨 （刘鹤 供图）

现代文学史上，浙籍文学家独领风骚

我这里有一个数据，1912到1949年的38年间，全国有名有姓的作家有700多位，浙江籍的有130多位。从人数上来说，差不多占了五分之一，但论实际影响力，无论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甚至戏剧领域，浙江作家都是带头人。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杂文方面有鲁迅，诗歌有徐志摩，长篇小说有茅盾，电影文学有史东山、夏衍，此外，周作人、戴望舒、穆旦等人，都是浙江籍的。民国时期的浙江，尽管是中国行政区划中很小的一个省份，却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大省。

我们说，如果没有李白、杜甫，唐诗会掉价一半；如果没有苏轼，宋词也会差好多。人文类跟科技类是有差别的，科技是站在前面巨人的肩膀上再提升一点，文学则不同，在文学上，一座丰碑就是一座丰碑，我们永远找不到第二个曹雪芹，也没有第二个鲁迅。所以，如果没有浙江文学新军，那么中国现代文学要逊色一半都不止。

民国时期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文学家？我们回顾一下民国的社会特征，一方面内外交困，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百家争鸣。在这样的氛围当中，作家会写什么？徐志摩就写花前月下的东西。艾青就写土地，写他所热爱的劳动的人民。鲁迅骂民国政府，骂看不惯的资本家，骂政府的走狗。郁达夫早期的文章，包括《沉沦》《银灰色的死》等，写了很多隐私的东西，把找对象、谈恋爱的事，都公之于众，这让当时的很多人受不了。

民国的时代特征，是内战、外战不止，长期的战乱使得文人具有更多的叛逆性和悲情性。当然，民国时期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艺市场的生成与发展，而“文学”作为一种商品，改变了以往的“载道”功能，而沦为娱乐、消遣的工具。文学商业化的形成，使得出版发行者的发行动机，以市场销量为终极目标；而作者的创作动机则从传统“言志”转变为“挣钱”。民国时期的文学市场运营机制已经十分成熟，且分工明确。

文学评论家严家炎先生曾说：“浙江自五四新文学以来，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，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：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，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；周作人是‘人的文学’的倡导者、现代美文的开路人；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，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；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，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，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；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，新格律诗的倡导者；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，等等。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，那么，浙江上空星星特别多，特别明亮。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么解释？”

民国时期的浙江出现那么一长串的文学家名字，除了时代和社会等外因，更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，那就是新文学生态链的出现，产生“簇群”效应。新文学的主要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，均以浙江人为主体，如创造社的郁达夫，文学研究会的茅盾，“现代派”文学团体的施蛰存和戴望舒等。中国文学的现代派实际上是在杭州诞生的，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。

浙江文学苍穹中的那些“星辰”

我首先介绍一下穆旦的诗。穆旦参加过远征军，当时中国在国际战场派了10万远征军，需要一大批翻译人员，他就自愿报名做翻译官。最后，10万人中有4万多人死在缅甸，不是打仗牺牲的。穆旦于1943年回国，野人山远征军的苦难一直压在他的心头。1945年9月，他发表了诗《森林之歌——祭野人山的兵士》，1947年，将题目改为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上的白骨》。这首诗很长，我对其评价是堪比屈原的《九歌·国殇》。世界诗歌史上，写亡魂、写士兵的诗人很多，但没有一个是像穆旦这样写出来的，那种听觉、视觉的感受，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是写不出来的。穆旦是浙江海宁人，海宁有穆旦的诗歌节。他还有一个堂兄弟，叫金庸。

徐志摩的诗非常美，柔美，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。徐志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诗人，讲到徐志摩就要讲到他的婚姻，民国时期的文人婚姻状况都很特别。1915年，他与张幼仪成婚，受西方教育的徐志摩不喜欢妻子，一定要跟她办离婚。离婚之后，他爱上了林徽因，但是林不答应。1926年，他与陆小曼结婚。1931年，林徽因在北平举办一个讨论会，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赶往北平，遇大雾飞机失事而遇难。年仅35岁的徐志摩离开了人世，也结束了他那文思灿然的译介与创作生涯。

鲁迅的小说充满反讽性，浙东乡土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反抗性，比如说柔石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，王鲁彦的《野火》，鲁迅的作品也一样。浙东这一带反抗性特别强，历史上抗清也是最激烈的，这些特征就体现在浙人的文学作品中了，给人印象深刻。

郁达夫的小说，一方面对于情感描写是赤裸裸的，另一方面小说中又充满着诗意。有人把他的散文当作小说，也有人把他的小说当作散文，两者之间界限不明，因为他都是以第一人称“我”书写的。他的小说分为几类，留学生小说，社会政治小说，还有历史题材的小说。他的“私小说”受众蛮广，影响很大，因为他非常率真，把自己的隐私全暴露出来了，他是民国时期作家中最大胆的。

茅盾写了好多小说，其中《子夜》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小说的代表，书中还提到炒债券，实际上跟炒股票类似。我认为这部小说非常了不起，体现了中国现代都市资本主义元素。小说结构庞大，光人物就有几百号人。

我对小说家施蛰存的评价也很高，专门在我的著作中列了一章。为什么？因为施蛰存就像大哥，有一大批人围在他身边，其中刘呐鸥、穆时英等后来都成为著名作家。他到90岁临死之前，还在为戴望舒编集子。

浙江的散文作家很多，徐志摩也写散文，诗人写散文都特别出色。郁达夫刚才讲过了，周作人、俞平伯、丰子恺等人，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。

电影文学界，除了夏衍，还有史东山，他是海宁人。电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新生事物，电影文学家在当时很受关注。史东山拍了好多电影，其中有一部很出名的叫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还拍了《新儿女英雄传》等优秀作品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鄞州区图书馆“明州大讲堂”，有删节。）